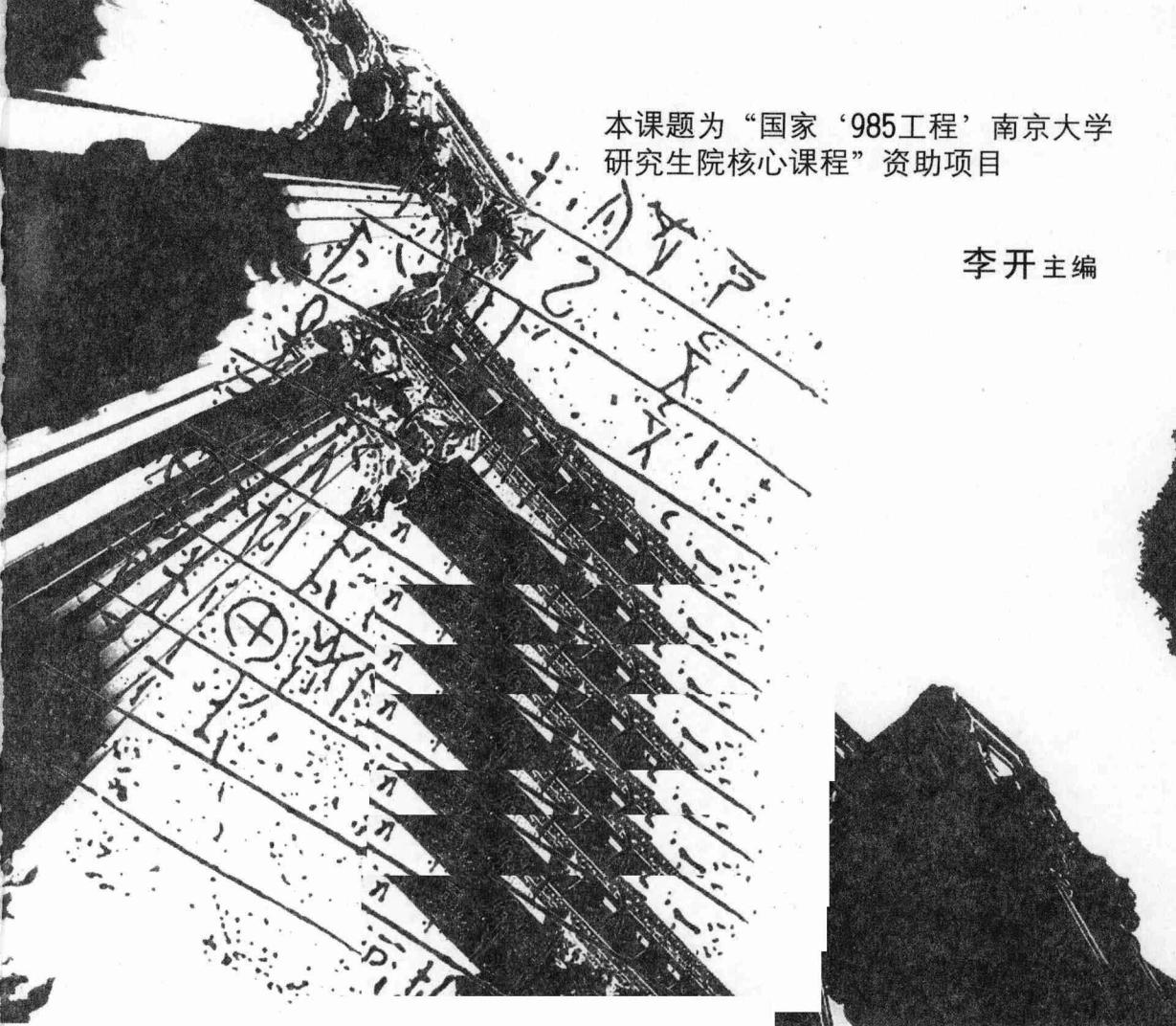


李开主编

理论语言学 哲理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课题为“国家‘985工程’南京大学
研究生院核心课程”资助项目

李开主编

理论语言学 哲理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论语言学哲理研究 / 李开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 - 7 - 305 - 06761 - 7

I. ①理… II. ①李… III. ①语言哲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3026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理论语言学哲理研究

主 编 李 开

责任编辑 翁 阑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5 字数 269 千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6761 - 7

定 价 29.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自序

理论语言学研究如何进行？国外虽然学出多门，林林总总，但大的学派不外有三：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以及由此而派生而出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以韩礼德为代表的功能语法学派，以及与此有关的语用学派、情景或语境分析、篇章分析；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认知语言学派。三大派虽各有特点，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理念论。究其原委，都和西方哲学的古希腊传统有关，即使深受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影响的功能学派也不例外，因为在那“不能想象‘没有形态的功能’的存在”（方光焘语）。

本体论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从柏拉图提出“理念”或“型相”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到亚里士多德确立形而上学，到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自己的哲学本体，无一不带有诸神的“神性”。这里的“神”当然不是后起的基督教的上帝，甚至也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格化了的神，如阿波罗神、雅典娜神、普鲁米修斯神，等等，而是诸神的精神，它恰恰是宇宙创生的动力因。

古希腊哲学观照的对象首先就是与诸神精神相似的“看点”，就是“型相”，“型相”就是精神。观照的时间多在某个节日里，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会，因节日的主要内容是祭祀神灵，奥运会的第一项内容是女祭司祭祀由主神宙斯建立的奥林匹斯神，祭祀是为了唤回诸神精神。节日观照的空间在公共的城邦，因为这一情境中多悲剧的演出，此中的观照直接引出诸神精神。“型相”同样是存在概念，故而柏拉图的“理念”论又被视为存在论意义上的“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则把自己的形而上“第一哲学”叫作“神学”。

哲学的根基就是形而上学，思考就是反思形式化了的对象，而对象的内容是形式化了的，从形上概念入手的。从根本上说，形上、形而上在西方哲学中不论在逻辑时间上还是在历史时间上，都被视作永恒的，是那里的永久性传统，“第一哲学”与形而上学也是同一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奥林匹斯诸神的“神性”即精神，恰恰都是西方古典理论的优越之处。

西方近代哲学从培根到笛卡儿,都是在继承古希腊哲学的基础上大有创新的哲学家。在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基础上培根著《新工具论》,强调归纳法;为推进古希腊“第一哲学”形而上原理,笛卡儿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作为他自己的形而上学“第一原理”或“第一真理”。康德是西方哲学中承上启下的代表,他的先验哲学就带有浓厚的诸神“神性”,他的认识的三个阶段:感性、知性、理性,特别是后两个阶段,都是理念化、形式化了的。他强调时间、空间是主体的直观形式,是直观的表象,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海德格尔把康德时空直观解释为与存在者“相遇”,但康德的直观形式是借助想象力形成的“绝对的统一性”,这完全是康德“先验分析论”中关于时、空范畴的“先验观念性”的全幅朗照,比柏拉图哲学范畴中的“理念”、“型相”更为形式化。康德所说的认识的对象或边界不在现实世界的此岸,而在先验世界的彼岸。康德不仅放大了城邦的“节日”里即可观照到的诸神精神,柏拉图的“理念”、“型相”,而且从很现实的城邦“节日”里更为明确地移到了彼岸。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是哲学而非语学,必然会体现古希腊“神性”精神传统。本然地说,古希腊原本就有很好的语言哲学传统。高尔吉亚思考过语言表达问题,苏格拉底主力给“善”等词语下定义,通过对语言表述式的意义和命题分析来“澄清思想”,还有诸哲对“名”的思考、逻辑语言的使用,等等,都需追求“神性”般的完美无缺,甚至象征“神性”,体现“神性”。维特根斯坦其实与康德十分相似。维特根斯坦早期语言哲学主张透过语言看世界,通过语言分析来达到对世界的分析,为此,需要建立起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的必然性关系假设。语言哲学中的“语言”本身,尤其是那种“必然性关系假设”,与康德的“先验的理念”,先验逻辑范畴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又相当于“第一哲学”中的理念、型相、形而上。蒯因则把本体论问题看作语言形式的选择问题,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就有什么样的本体论。

由以上可知,西方哲学的基本特点就是在彼岸世界中思考,“神性”、“理念”、“型相”、形而上、先验知性、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的“必然性关系假设”、“语言形式”本体,等等,无不体现这一基本特点,所不同者仅“彼岸”之程度深浅有别而已。

西方理论语言学三大派是语学而非哲学,同样体现了这一传统,古希腊传统不仅对哲学、语学,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方方面面,可谓无处不在。索绪尔受康德的影响已获初步研究,乔姆斯基受笛卡儿的影响反复被提及,归根到底都是古希腊传统的不断“延异”。我国传统的研究法,与西方大不一样,其根源,如冯契先生所说:“中国的儒家、道家都否认在人世的彼岸的天国,他们不

把此岸与彼岸割裂开来。”

我国对理论语言学的引进和研究,不外乎两大学派:一是纯理论派,以南京大学的方光焘先生为代表,或称为南方语言学派;一是历史经验理论或称实践理论学派,以吕叔湘、王力先生为代表,强调与汉语研究实践相结合的语学理论,或称为北方语言学派。当然,前者并非不要汉语研究实例,后者并非不要理论元素和理念要义,而是各有侧重,视角有别。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既处处结合现代汉语语法实际,又充满结构语法和功能语法理论分析,是现代语法理论的永远的经典。虽说有南方“稻作文化”和北方“麦作文化”之分,但古同今然,从来就是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不过,南方和北方的区别很明显,且这一区别对理解晚近中国理论语言学传统显然是重要的,承认南北对峙、两峰高耸是必要的。

以“历史经验理论或称实践理论学派”来指认,实在是崇高伟岸贴切之词。“历史经验理论”是从经验现象层面来理解历史过程的内涵的理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汉语语言学恰恰就是不折不扣的“真正实证科学”。至于“实践理论”的提法,正如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布近百年,特别是近三十年的理论事业,总结历史,学界认为正确的途径和科学的表述应当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实践”不同于物质,“实践”包含“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包含人的能动性在内。“实践”不同于现实,黑格尔《小逻辑》则把现实性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亚里士多德则以“潜能”和“现实”的关系作为哲学的重大问题,马克思高于前人,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

现在我要专说纯理论学派。可以说,它的命运是不佳的。20世纪 50 年代学习苏联,理论界一律以斯大林、日丹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为话语霸权,80 年代初,开始拨乱反正,逐步废弃日丹诺夫的许多提法,有些人将语学理论与废弃日丹诺夫攀成同一性,误以为学习语学理论无补于文字、音韵、训诂,“搞理论就是说空话”,“理论无用”。不过,我要说,以南京大学方光焘为代表的语学纯理论派是南方语言学派中的重要一支,如称其“南京大学语言学纯理论学派”亦可。这一支“南方/南大学派”有何特色呢?

一是尤重西方语学理论的引进。方光焘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就已在日本、法国研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30 年代末就研究了布龙菲尔德语法理论(1939/1997,见《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7 页)。新中国成立后以南京大学理论语言学阵地为讲台,系统讲授索绪尔的结构主义(1962、1963/

1997,437页);与此同时,还讲论房德里耶斯结构主义(1962/1997,317页)、梅耶语言学说(1959/1997,495页),叶斯柏森语言学说(1962/1997,326页)、美国描写语言学家哈里斯的结构主义分布学说(1962/1997,291页)、美国萨丕尔的人类学语言学(1962、1963/1997,329、442页)、以叶尔姆斯为代表的哥本哈根语符学派(1962、1963/1997,302、448、503页)、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1963/1997,301、342、509页)、霍凯特语言学说(1962/1997,328页),此外,还包括引进前苏联的语言理论(1956/1997,39、40页)、美国卡尔纳普语言哲学(1963/1997,509页),等等。

二是强调西方理论语言学固有的西方文化元素:源于古希腊“神性”的“形而上”思维和理念思辨。方光焘深明语言、言语区分之理,这“二字颠倒”式的区分正是西方“形上”思维、形式化理念的产物,这一区分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科学的。从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文法革新讨论”,到50年代的汉语词类问题讨论,他都主张以“广义形态”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关于汉语语法研究,则主张“凭形态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1939/1997,6页)。

三是强调理论语言学的现代性。最明显的,方光焘主张西方传统理论要大力吸收现代高科技知识,探寻语言科学新路。他指出,哥本哈根语符学派“形式化的研究对于机器翻译十分有用”(1963/1997,509页)。循此思路,方先生的学生黄景欣发表了长文《就语言研究的精密化趋势论语言和言语的区分问题》(1962/1995)。

四是在历史语言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方光焘用他的理论研究过“古汉语被动句基本形式”等问题(1961/1997,56页)。方先生的同事,著名训诂学家洪诚教授系统研究汉语史学,选编《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并讲论之,与他的《训诂学》和一系列汉语史学、三礼学论文一起,成为南大语言学派最辉煌的历史语言学成果,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成了汉语史学科的理论科目。黄景欣则撰有长文《论我国语言学遗产的继承问题》(1961/1995),最早提出了“中国传统语言学”学术概念及其研究问题。

五是在理论层面上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理论上的创新。方光焘的学生徐恩益等编著的《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是最早尝试用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来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书。理论上的创新,莫过于方光焘大弟子胡裕树先生会同他的同好、著名语言学家张斌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三个平面”的理论。“三个平面”的理论从词类划分、短语结构研究、析句法、句型研究等一路走来,但它归根到底导源于方光焘“广义形态”说。50年代讨论词类划分时,胡裕树、张斌就用“广义形态”作标准划分

词类，并具体地说，名词的“广义形态”是前面可加“一个”“这个”“这种”等；动词的“广义形态”是前面可以和“不”“会”“能”等相结合，后面可和“了”“着”“起来”“下去”等相结合，并可以重叠。范晓先生曾评论说：“现在，一般的语法教科书在讲到词的分类时，都要强调凭词与词的结合关系来分类，这是汉语语法学的一大进步。”（1998）“词与词的结合关系”就是最早由方光焘提出，陈望道先生基本赞同，并经胡裕树、张斌先生加以实践应用的“广义形态”。关于“三个平面”语法理论析句原则，胡裕树先生概括说，那是“一个基础（以句法为基础）、三个结构（形式与意义相结合、句法与语义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先是句法与语义相结合来分析静态单位的结构。在句法上作层次、关系、功能和格式（句型、句式）的分析，再把语用因素加进来，作动态的分析。”可以说，在“把语用因素加进来，作动态的分析”之前，没有一项离得开“广义形态”和“形态”这个基本点。

值此南京大学语言学走向继往开来的新的发展时期，恕简切其事。

以方光焘、洪诚为奠基人的“南大语言学派”的第二代，理论建树多多。主要有：

鲍明炜教授提出了以《广韵》研究和唐代诗文用韵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中古语音史理论（1990），并以阐扬黄淬伯先生的上古音研究成就为基点，申论上古音研究系统（1998），在方言调查的基础上构建方言音系及方言发展史解释理论（2002）。

卞觉非教授提出了“汉语语法分析方法”术语，明确其内涵（1980），具体阐释层次分析法的应用（1981）；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中基础汉语教学阶段文化本位理念，及文化导入中的项目划分原则和范围（1992）；关于对外汉字教学中“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1999）。

许惟贤教授综论联绵词，认为联绵词有不可拆分和可拆分两大类，提出了联绵词语素融合论（1988）；在传世之作《说文段注》整理本的序言中，对以段注为代表的传统语言学作了有针对性的阐释，在“附注”中则抉幽发微，校订段注达1270条，书中《类比字索引》收条目达5335条，破天荒地提出了段注字族、语源研究法（2007）。

王希杰教授是汉语修辞学大家，也是理论语言学专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出了若干富有创新性的理论，主要有：作为修辞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四个世界“物理、语言、文化、心理世界”的划分及其错综关系的认知（1996）；在比利时列日学派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四个世界”修辞关系分析视角“零度和偏离”（1996）；传统修辞学是显性修辞学，现代修辞学是潜性修辞学，它包括

潜词、潜义、潜句、潜修辞格、潜修辞手法,还包括潜性对象、潜性自我、潜性环境、潜性话语、潜性交际效果等,大大拓展了现代修辞学的范围(1996)。以上三条,已被学术界统称为“三一修辞理论”。

蒋荫楠教授编写的《同义成语词典》(1987、2001、2006)和《反义成语词典》(1988、1991、2001、2006)一版再版,在汉语教学和国际汉语教学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将辞书编纂实践和编纂理论紧密结合,尤在书证和释义方面有贡献。在修辞学方面,尤重散文修辞研究,并提出了修辞专论和名篇赏析相结合的研究法(1988)。

杨建国教授对近古汉语词汇、语法作了精深的研究,在全唐诗“一作”校证中提出并实践了“恰如数学的求证”,“一系列严密的推理过程”之方法。(1997)

罗振坚教授系统阐述了汉语词义引申义(1996),而引申义正是词义的主干。

鲁国尧教授是音韵学、方言学大家,也是中国语言学史专家。阐述近代语音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1985/2003);对宋代词韵作穷尽式研究,得出可分十八部的结论(1991/2003);以金元词曲韵研究廓开《中原音韵》研究新思路(1990、1991、1996/2003);以宋代音韵学史和宋代语音史透析《罗宗迈切韵法》及其对语学学史研究方法的启示(1994/2003);以《诗经》用韵推求上古音系统(2006)。方音、方言史研究,考论通泰方言与客、赣方言同源,现代江淮方言始于4世纪(1988/2003),进而提出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1991/2003);以《颜氏家训音辞篇》“南染吴越,北杂夷鲁”诸语为“谜题”,解其4世纪前古吴方言与南朝通语接触、感染之若干语码(2002/2003)。跨入21世纪以来,鲁老师尤重理论研究,提出了若干新见解,诸如“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2002/2003),等等。

“南大语言学派”的第三代、第四代传人,理论建树也不少,允述其要:

滕志贤君有《诗经》研究史论(1996)和训诂学要论(2008);薛正兴君著《王念孙、王引之评传》,长篇大言近60万字,追寻高邮二王从中国古典校勘学走向近代化的路标,系统考论二王在文献学和传统语言学方面作出的特别重大的贡献(2008);柳士镇君汉语历史语法理论(1989、1992/2007)、语文教育论(1998)和与汉语史密切结合的汉语文化史论(1992);万业馨君提出了古文字形态学“关系位”说(2002)和第二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文字理论(2005);汪维辉君的汉语词汇史系统理论(2007)和专书词汇语法研究史论(2007);刘晓南君围绕汉语语音史和《切韵》音系的音韵学史论(2007),以及汉语历史方言研究

史论(2008);高小方君的古代汉语课程建设和教学法理论(2003、2006),语言文字学史料学(1998)和汉语史语料学(2005)理论;杨锡彭君的汉语语素新论(2003)和汉语外来词研究(2007);郭熙君的现代汉语汉语语义语法存现范畴分析理论(1986)和基于语言观与社会文化发展史的社会语言学理论(2004);吴淮南君的汉语词语音节构成理论(2003),对外汉语教学法(1995、2000)和网络语言研究(2001);徐大明君关于社会语言学言语社区系统理论(2007)和语言变异与变化理论(2006);裴文同志重译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2002),从“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来理解和宏扬索绪尔的学术精神(2003),力图寻绎语言世界时空(2006),在以32种语言为观察对象的基础上,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追问研究对象,尝试建构有个性化特征的普通语言学(2006);顾黔同志的通泰方言音韵研究(2001)和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方言地理学研究(2006);薛遵同志新词新语选目问题研究(1992)和隋唐吴语史论(2006/2008);盛林同志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发展史论(2005)和历史语义学理论(2008),等等,熠熠放明,璀璨浮光。推究其缘由,盖诸君生活在“需要巨人”(恩格斯语)并具备产生“巨人”条件的时代。

本书编写组由顾涛、盛林和我三人组成。前16章由顾涛同志据本人讲课录音整理完成,在整理过程中,他又逐一核对了相关文献,并新增不少史料,收集传主相片,打印稿交我后,我陆续审阅校补过。第十七章由盛林同志执笔撰成,第十九章由顾涛同志另行组稿撰成,编入本书时,我都审阅过。又第十八、二十章由我本人执笔写成。主要参考书目和索引由顾涛同志和我共同编定。不管哪部分,总之,书中铸错,全由本书责任人李开负责,理论是严肃的,责任是沉重的,鄙深知。好在本书一开始拟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已由三名外审专家审查过,对外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已全部吸收,一一改进或改正。亦借此机会,对外审专家表示深深的谢意。这次改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荣卫红同志为此付出了很多辛劳,亦深表谢意。

自序中对南大语言学派的归纳,本人抱着负责的态度从事之,写出后请院学术委员会有关领导审阅过,但仍完全由本人负责。

本课题为“国家‘985工程’南京大学研究生院核心课程”资助项目,谨此致谢。

是为自序。

李开

2009年6月16日于南京市龙园北路80号寓所

目 次

自序	1
第一章 古代的语文学和语言学：轴心时代的轴心文明	1
一 古代语言学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	1
二 苏格拉底的语言经验知性的“自然性”原理	4
三 斯多噶学派的语言学说：对“自然性”原理的推广	6
四 亚里士多德的三分四因、识句五标准和语义标准四义	7
五 “惯例派”亚里士多德语言学要义	8
六 亚历山大学派的《几何原本》和《语法科学》	9
第二章 历史比较法和历史比较语言学：19世纪的大学问	11
一 历史比较语言学前科学时期的语言搜集	11
二 历史比较语言学发生的哲学背景	14
三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拉斯克	18
四 历史比较语言学继承者葆朴的《动词变位系统的比较》	19
五 格林定律	20
六 维尔纳定律	22
第三章 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说和破解人类“创造性”之谜	24
一 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到理论语言学的逻辑发展	24
二 洪堡特的身世	25
三 康德哲学及其与洪堡特的联系	26
四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对洪堡特的影响	29
五 洪堡特理论语言学的发展历程	30
六 洪堡特理论语言学的内容要点	32
七 洪堡特理论语言学的影响及评价	33
第四章 索绪尔语言学及其学术背景	35
一 索绪尔的身世与其学说的问世	36
二 索绪尔的语言学说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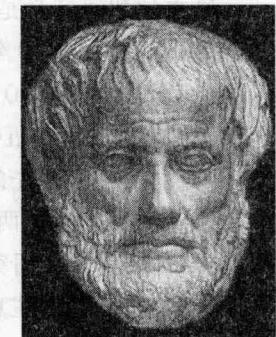
三 索绪尔语言学的认识论根源	39
四 涂尔干“社会事实”中的外部制约规范、集体心智规范与索绪尔语言学的联系	43
五 索绪尔时代的理论三杰	44
六 惠特尼和索绪尔的表层联系	45
第五章 索绪尔理论语言学要点解析	46
一 索绪尔从历史语言学走向结构语言学	46
二 语言和言语的区别	50
三 能指和所指的区别	52
四 共时和历时的区别	53
五 系统即结构	54
第六章 梅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发展	56
一 梅耶的身世	56
二 梅耶历史比较语言学总述	57
三 梅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般原理:《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精粹六论	59
四 对梅耶的几点试修正	62
五 与梅耶同时代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及梅耶理论存在的不足	64
第七章 叶斯柏森和他的《语法哲学》	67
一 叶斯柏森的语言学道路	67
二 斯宾塞的经验综合哲学对叶斯柏森的影响,叶斯柏森的音义关系“形式论”	68
三 叶斯柏森的语言进化论	70
四 穆勒的归纳逻辑学和叶斯柏森的语言研究方法	71
五 叶斯柏森《语法哲学》的理论要点及其影响	72
第八章 叶尔姆斯列夫和哥本哈根学派的主要理论	76
一 叶尔姆斯列夫行年述略	76
二 哥本哈根学派的哲学逻辑视角和两次被发现	77
三 哥本哈根学派的哲学含义:两项比较,附论方法	79
四 语符学派要论	82
第九章 以理论精辟著称的房德里耶斯《语言》	86
一 房德里耶斯和他的名著《语言》	86

二 房德里耶斯《语言》的哲学背景	87
三 房德里耶斯的语言本质论：“社会心理”论	88
四 房德里耶斯对语言共时和历时系统的深入研究	90
五 房德里耶斯论语言的进步	91
第十章 布拉格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特鲁别茨柯伊和雅柯布森	93
一 功能学派和功能语言学	93
二 雅柯布森功能语言学的哲学原理	95
三 语言价值哲学	96
四 功能分析范畴种种	97
第十一章 美国早期语言学：由人类学引发的描写语言学	100
一 美国语言学的特性	100
二 鲍阿斯和他的描写语言学方法	101
三 萨丕尔语言观的哲学背景	103
四 萨丕尔《语言论》的理论要点	104
五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108
第十二章 美国描写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的行为主义语言哲学	110
一 布龙菲尔德的身世	110
二 从冯特个人心理主义到华生行为主义的转变	111
三 布龙菲尔德的习见实例实验分析及“刺激-反应”公式	113
四 《语言论》的主要内容	115
第十三章 布龙菲尔德的形式类和历史变异说，布龙菲尔德后学的分布说和中心系统描写程序论	118
一 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分期	118
二 布龙菲尔德的形式类及其哲学意蕴	119
三 布龙菲尔德后学哈里斯和《结构语言学》	121
四 布龙菲尔德后学霍凯特的语言习惯理论和语言信息理论	122
第十四章 乔姆斯基语法理论“语言习得机制”假设的观念形态和构造层次	127
一 乔姆斯基和学术新潮	127
二 “9·11”事件以后的乔姆斯基	130
三 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哲学背景	131
四 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核心：“语言习得装置”假说	134

第十五章 乔姆斯基第一语言模式时期及标准理论时期的句法理论	139
一 乔姆斯基语法学理论的五个阶段	139
二 乔姆斯基句法普遍性规则的依据	140
三 第一语言模式时期对“有限状态语法”的批判	142
四 对第一语言模式时期“短语结构语法”的评价	143
五 “转换语法学”的提出及其实质	144
六 标准理论时期“生成语法学”的18条规则	146
第十六章 乔姆斯基对标准理论的扩充与发展	149
一 乔姆斯基标准理论引发语义危机的产生	149
二 关于语义问题的争论及“格的语法学”的提出	150
三 修正后扩充标准理论时期的十大语法规则	150
四 乔姆斯基对人类普遍语法规则的永恒探求	152
第十七章 菲尔墨与格语法学	155
一 菲尔墨的格语法学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学	155
二 格语法学理论的核心内容	156
三 菲尔墨第一阶段的格语法学理论	157
四 菲尔墨第二阶段的格语法学理论	159
五 格语法学的突破与贡献	161
第十八章 伦敦学派和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	164
一 从人类学走向语言学	164
二 弗斯的语境学说和功能语言学	167
三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171
第十九章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内核：“普遍语用学”	
构造模型	175
一 批判理论的重建和“语用学转向”	175
二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普遍语用学”	177
三 交往资质理论的乔姆斯基、皮尔士根源	179
四 “言语行为理论”的奥斯汀、维特根斯坦根源	181
五 德国本土哲学和语言学的深厚传统对哈贝马斯的影响	184
第二十章 认知语言学的学理逻辑	187
一 认知、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科学	187

二 认知心理学和由心理活动组成的发生认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一般解释原理.....	188
三 认知结构、认知心理结构和认知语言结构	191
四 普通认知语言学和神经认知语言学.....	192
五 认知心理语言学.....	195
六 认知语用学.....	197
主要参考书目	201
重要人名索引	204
重要名目索引	209
跋.....	220

第一章 古代的语文学和语言学： 轴心时代的轴心文明



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

一 古代语言学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①于 20 世纪中叶提出世界历史发展“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的概念，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中指出：“看来要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和在公元前 800 年至 200 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正是在那里，文明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轴心期’(Axial Period)。”^②核以中国历史，公元前 841 年是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 770 至前 476 年是春秋时期，公元前 475 至前 256 年是战国时期，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正值我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而这一时期世界上同时又有古希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这是理性的人、智慧的人、文明的人成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大写的“人”才真正形成了。

^① [德]雅斯贝斯在 1932 年出版的三卷本《哲学》(*Philosophie*)中系统阐述了存在主义的思想，他与海德格尔并列为德语世界中存在主义哲学的两大代表人物。雅斯贝斯认为哲学不应当仅仅是推论和说明概念的体系，而应该揭示人类的生存活动，哲学本体存在于人类的哲学活动之中；真理是多元的，每一个具体的真理样式都有其特殊的含义。因此，雅氏强调生存交往，只有在交往中自我才是真正存在的。由此，语言是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那么人类的本性就是使用语言。就哲学思想上看，雅斯贝斯比海德格尔更接近于康德。康德哲学的一条重要的原理是人类凭理性认识自我。而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一种本然的实存，必然的存在；雅斯贝斯的存在是一种可能的存在，不是先验的、永恒的，他并没有把人类的先验存在看作人的本质，人类是或然的、可能的存在，与康德在学理上有相通之处。

^② [德]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1949 年出版德文版，1953 年出版英译版，中文版由魏楚雄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

语文学和语言学是轴心时代的轴心文明。美国语言学家葛林伯格(J. H. Greenberg)曾在1973年撰文,文题为“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Linguistics as a Pilot Science),罗马尼亚语言学家马尔库斯(Solomon Marcus)1974年发表同题文章。^①伍铁平更从汉语研究史的角度加密论证,在国内首先提出“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的重要论断^②。语言学不仅在现代学科的发展中是这样,在古代,在两千五百年前同样也是这样。由语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对语言的重视和研究,同样构成了那个时代文明的“轴心”。

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新思想的产生所包含的新术语,所带来的语言的更新。美国学者费正清曾经指出:“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新生的术语“用来盛放许许多多基本上不知其为何物的东西、未经诠释的信息和没有解答的玄理”,“一旦被具体化为一种自在之物,它是有可能取代思想的”。^③回顾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西洋文明大量涌人的中国思想界,面对“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的时代现状,王国维特于1905年撰成《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文章认为:“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④王国维所言甚是,文明发展的进程与新的术语、新的语汇的产生是分不开的。这在轴心时代各大文明的构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方面,轴心时代的文明原理完全是用语言来表述的,表达中往往产生新的语汇;另一方面,这些哲学原理中处处体现出语言学的原理,围绕术语的研究,围绕语言的研究层出不穷。如《庄子·逍遥游》引唐尧时期名士许由的话,提出“名者,实之宾也”的著名命题^⑤,意指名称代表客观事物,但又因与之不同而独立,处于宾位,之后到《管子·九守》则发展成了“名生于实”。先秦显学墨家代表人物墨子(约468~376)在《墨经》中则对名称作出分类,《经上》云:

^① [美]葛林伯格《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原载 *Themes in Linguistics: The 1970's*,有傅怀存中译文;[罗马尼亚]马尔库斯《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科学》,原载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有易敏中译文。两文均收入伍铁平编著《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论语言与语言学的重要性》,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参见伍铁平编著《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论语言与语言学的重要性》。

^③ 见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④ 收入《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7~101页。

^⑤ 见〔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4页。